

## 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

本世纪以来，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执，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始终未曾平息，迄今仍在延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要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坚持历史决定论，就必须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决定论的经典形式，因其理论上的缺陷或不完备而受到挑战。它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放弃决定论而站到非决定论一边。由于“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sup>①</sup>，因此放弃决定论就意味着放弃历史发展规律及必然性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很多理论都证明了非决定论的非科学性，指出它是导致唯心主义的一条通道，因而是不可取的。二是把辩证法引入决定论，发展决定论的形式，使之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成为辩证的决定论。这就需要解决以下难题：第一，在因果必然性之外，还须承认另一些形式的必然性（如统计结果的必然性、系统组织演化的必然性等）；第二，在必然性之外，还须承认偶然性与决定论的相容性或一致性，增加决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 页。

定论的容量；第三，如果在因果决定论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决定论形式，那么这些形式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适用场合也有待说明。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心选择后一条道路。

## 一、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

根据当代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进化的状况，历史决定论应该包括如下三种形式：以因果必然性作为基础的因果决定论、以统计规律作为基础的统计决定论和以系统演化规律作为基础的系统决定论。

因果决定论是历史决定论最基本的和最初的形式。

因果性联系所揭示的是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结果对于原因来说，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从拉普拉斯（P. Laplace）开始，决定论与因果性就结下不解之缘。拉普拉斯决定论就是奠基于牛顿力学的因果律之上的。当然，因果联系不是事物联系的全部，它只是事物间各种联系中的一种。事物还有非因果的联系，如结构联系、功能联系、时空联系、层次联系、系统联系等等。但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却是一种最普遍的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根据事物因果必然性而肯定事物发展规律的决定论。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社会历史领域中流行着非决定论、宗教决定论和理性决定论的观点。列宁曾指出过它们的两个主要缺点，这两个缺点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的缺点，同时也是费尔巴哈、霍尔巴赫这样的唯物主义者的缺点，正是这两个缺点导致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成为唯心主义者。列宁指出：

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序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是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者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sup>①</sup>

历史唯心主义者游离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之外，撇开了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因而不能理解社会运动的真正原因。历史唯物论则首先肯定社会运动的物质根源，即肯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本质上找到了决定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时，把社会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当作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中找到了社会关系的本质联系，第一次把社会理论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因而否定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形形色色的非决定论以及宗教决定论、理性决定论。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最初是从因果联系方面，即从社会关系的物质根源，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方面来批判唯心主义的。而现代西方的一些历史非决定论者，往往通过否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而否定历史决定论。例如，K. 波普（Karl Popper）就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联系，不承认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6 页。

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他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sup>①</sup>。这一理论分歧说明，是否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一个基本冲突。因此，我们坚持因果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内容。

历史决定论的第二种形式是统计决定论。

决定论强调的是必然性和确定性，机遇却表明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大量历史事件都是以偶然的形式发生的。虽然作为微观历史事件本身，它们的产生大都是有原因的，但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它们却常常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sup>②</sup>

但是，偶然性与决定论却是相容的：偶然性可以通过统计平均进入决定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Max Born）认为：“即使偶然性也不是完全任意的，因为存在着一些机遇律，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sup>③</sup>，“我们至多只能说是‘有规则的偶然性’。我们必须假定机遇律的存在，这些定律假设，自然界或人类活动是有规律的”<sup>④</sup>。在物理世界中，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发现物质运动的规律性，揭示物质现象联系的必然性，因而也就有了“统计决定论”。统计规律表明，事物的宏

① 参阅 K. 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4、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3

③ 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7 页。

④ 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9 页。

观性质可以看作是大量无规则的微观量的统计平均结果。因此，与揭示确定对象的必然性的因果律不同，统计规律所揭示的，是大量随机的、非确定的对象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必然联系，是随机事件、非确定事件的整体性规律。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我们可以把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变迁称为宏观事实，把个别人物的行为、个别的事件称为微观事实。宏观事实服从因果律，可以用因果决定论解释。微观事实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人物的活动、个别事件是不自觉的，或意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事实是随机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它与量子统计理论中的粒子活动情况相类似。虽然这种单个的微观事实无因果性，是偶然的，但一定数量的微观事实和整体却有必然性的结果，服从决定论的规律。微观事实的第二种情况是，个别人物的活动、个别事件都是为达到一定结果而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事实是因果性的而非随机性的，但是，一定数量的微观事实的整体结果却否定了各单个微观事实的因果性。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著名论述，精辟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历史的发展在很多“单个的意志”作用下前进，但“单个的意志”是相互交错的力量，它们“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sup>①</sup>，才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的微观事实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一般都是随机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因此统计决定论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系统决定论是历史决定论的第三种形式。

现代系统论是本世纪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系统论在更高的层次上，从细节和整体的结合方面揭示了事物内部的有机联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系及演进机制，为哲学开拓了新的视野。

根据系统理论，任何现实存在着的系统都是统一的客观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不是某种神秘的未知力量活动的结果。系统的演化，严格地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演化的结果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系统的发展，并非服从单一的、个别的因素，而是系统整体的服从：信息输入、控制、反馈、调节……系统中任何要素、任何环节，对作为结果的现实系统来说，既是原因，又不是原因，它们都不可能单独地发生作用；它们的机械加和也不能决定系统的演变。系统的质（综合质或整体质）是决定性的，但它不是由线性因果关系或各要素统计关系所决定，而是由系统整体的演化规律决定的。这就是系统决定论。

现代的历史决定论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即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样就能认识到，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此类现象群中的一个，在它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某种新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某种生产方式只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某种分配方式只是生产关系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某种政治制度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所有这些都包括在社会有机系统中。根据系统决定论，对于社会系统的认识，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它的各组成要素的分别研究，即使我们穷尽了它的所有要素，如果不从整体上观照这个系统，我们还是不能把握社会的本质。而且，离开了对社会运动的整体了解，也不可能对社会的各构成要素有完备的理解。

现代系统论给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依据，使历史决定论中原有的系统内容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发展成为完整的新形式。系统决定论既从宏观又从微观，既从静态解剖结构

又从动态发展机制，既从必然性又从偶然性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规律，因而是与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相并列但又高出这二者的综合决定论。

## 二、决定论形式的历史演变及逻辑关系

历史决定论形式的演变和发展，既是社会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自身的要求。从实践方面看，社会历史现象日趋复杂多变，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日益增多，人们想要在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之网中获得科学的认识，单靠简单的理论形式或认识工具已无法完成。同时，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对单个历史事件或多个历史事件集合的认识，而要求进入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从理论上或者从思维至上性的角度来说，诚然人类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但现实中单个完成的认识只能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渐次地接近事物的本质。科学愈向前发展，人类认识能力愈强，就愈能认识到事物更多的联系和更深层的本质。理论既是认识的结果，同时也是认识的工具，因此认识的深化有赖于理论形式的完备。在社会认识中，单一的决定论形式已愈来愈容纳不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为了能够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它自身必须向前发展。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就是人们在认识社会现象中总结出来的逐渐深化的三种理论形式。决定论形式在演进中日趋完善，说明它的发展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决定论的最初形式是建立在经典物理学严格的链锁关系基础之上的严格决定论。拉普拉斯对严格决定论作过经典的表

述<sup>①</sup>。可以把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思想简单概括如下：对于力学的运动方程式，只要给出初始条件，那么就允许无歧义地绝对地求出系统以后的运动。因此，在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由于严格的因果链锁关系，从过去到未来的全部发展可以完全确定地被推导出来；换言之，严格决定论把宇宙的未来当作一个从细节上都可以预言的过程来对待。拉普拉斯自己所发明的偏微分方程式——拉普拉斯方程，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样板，因为它确实能体现严格决定论的模式，可以由初始条件加边界条件而决定以后的一切。在以严格决定论为典型代表的近代思维方式中，事物的因果联系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普遍、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联系。这种严格的因果决定的思想，受到科学史的批判。先是统计物理学，然后是量子力学向拉普拉斯决定论提出了挑战。统计物理学表明，分子现象服从确定的统计性规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温度，单个分子并没有温度，温度是大量分子聚集起来以后表现出的总体特征。量子力学更是超出了因果律的视野，提出了关于因果性、机遇与决定论关系的问题，导致本世纪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卷入了一场持续 40 年之久的论战。量子力学表明，单个量子过程是几率性的，对它只能作几率的描述和预言，因而量子力学规律在本质上是统计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玻恩说：“量子定律的发现宣告了严格决定论的结束，而这种决定论在经典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结果本身有着巨大的哲学意义。”<sup>②</sup> 玻恩严厉地批判了严格因果关系的“抽象无时间性”的缺陷<sup>③</sup>。无时间性意味着运动的可逆，而

参阅拉普拉斯：《概率的解析理论》，1812 年法文版序言。

② 玻恩：《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58 页。

③ 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 页。

我们知道，社会历史恰好是不可逆的。玻恩还指出，单一因果关系是“将所考虑的系统孤立起来，对可变的因素加以限制，改变条件，直至结果很明显地依赖于单一的因素”<sup>①</sup>。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和实验室的操作结果中。

然而，对严格因果决定论真正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的挑战，是自然科学对偶然性的新解说。基于严格因果律的传统决定论在处理偶然性问题时有以下两种方式：一、认为客观世界不存在偶然性，所谓偶然性的存在是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所造成的，一旦人们的认识深化，深入到某种“隐秩序”之中，那么偶然性就成为必然性。因此偶然性只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个驿站，是暂时性的存在，它在客观上是可以被排除的。二、认为偶然性问题不能纳于任何规律中，因而是无足轻重的，可以不加理睬。对于偶然性的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sup>②</sup>。但是，偶然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或认识上的问题，它更主要地是一个客观事实存在的问题，正如当代一些科学家所指出的，偶然性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客观模式。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 Monod)甚至还证实了“本质上的偶然性”的存在<sup>③</sup>。在量子统计中，单个粒子和基元过程本身具有先天的、固有的不稳定性，这也是一种“本质上的偶然性”。现代自然科学把偶然性作为一种回避不了、消除不了的客观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揭示出客观事物并不全都服从因果必然性，并不全都可以作确定的和精确的描述。在这里，偶然性已超出了因果视野之外。现

① 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1 页。

③ 参阅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5 页。

代科学已不像经典科学那样，把偶然性当作事物的外在的、个别的、局部的、非本质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联系，而是赋予其普遍的、根本的意义。

这种认识，对于社会历史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总有无穷的偶然因素在破坏确定的因果关系，使得个体行为甚至某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呈现出不确定性。如果否定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偶然性，既无法解释历史事实，也在理论上失去了逻辑合理性。正是由于严格决定论把因果必然性作为唯一理论基础这一缺陷，K.波普才提出了以下责难：“牛顿理论的成功，尤其是能够长期预报行星的位置，给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他指责历史决定论无法制定一个“社会日历”，因而不是不成立的<sup>①</sup>。如果坚持严格因果决定论是决定论的唯一形式的观点，就不能避开像波普这样的指责。

严格因果决定论的困境表明，单纯的因果链锁关系承受不了必然性和决定论的理论分量，因而不能成为决定论的唯一基石。决定论的确与必然性相联系，但客观世界并非仅仅只有因果必然性，而无其他的必然性；科学的发展揭示出，不仅“因果”可以导致必然性，“概率”也可以导致必然性。决定论的确意味着完备定律和秩序，但它并不排斥偶然性和机遇，偶然性和机遇通过统计平均可以进入决定论。统计规律既然是一种规律，统计结果既然具有必然性，那么它就不是非决定性的而是决定性的。以往的因果决定论由于只分析单个事物间的对应关系（因果相当），视野十分狭窄，因而不能达到客观世界的

<sup>①</sup> K.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10页。

更广阔和更深入的领域，至少不能达到大量个别事件集合的场合。统计决定论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因果决定论的这一不足，增加了决定论的容量。因果决定论也就不再是描述社会历史现象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严格决定论作过经典表述的拉普拉斯，同时又是概率论的研究者。尽管拉氏仅仅把概率看作是因果决定论框架内的一个次要成分，认为它的出现是由于人们主观知识不足而引起的，但这实质上等于承认了严格决定论在解释物理世界时的不足，而偷运了另一种补充形式，即统计决定论。

统计决定论的出现，是一次传统思维模式的大决堤。如同严格决定论在诞生之时对神学决定论的冲击一样，统计决定论动摇了曾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严格决定论的绝对权威。这一转换，甚至还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思维模式补充或取代另一种思维模式，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既然牛顿时代最值得夸耀的科学成果都存在着缺陷或不足，那么科学中还有什么永恒高贵的呢？既然被千百次实验证明了的、具有数学精确性的严格决定论都可以被别的决定论形式所扬弃，那么为什么不能继续向前探索更高一级的决定论形式呢？这正是系统决定论诞生的逻辑前提。

如果说，统计决定论的出现主要是从量的规定性方面补充并推进了历史决定论，那么，系统决定论则在根本上完善了历史决定论。

从视野的广阔性方面来说，统计决定论是优越于因果决定论的。它在大量分散的、似乎不相关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必然性，它使一般的偶然性通过统计平均进入必然性从而进入决定论。但是，统计决定论也有着致命的理论弱点。其一，它用统计方法使偶然性进入决定论，但是有些偶然性（如莫诺所说的

“本质上的偶然性”），即使是用统计方法也不能说明其未来发展。莫诺通过对原始生命起源和生物遗传分子的研究，发现突变作为一个量子事件服从不确定性关系，且 DNA 中一个突变的原因与突变造成的功能效应无关，因此他指出，生物界的某些客体、事件是独一无二的，是用统计方法也不能预言的<sup>①</sup>。这里的偶然性具有先天的、固有的不确定性，要说明它，甚至连统计规律也无能为力了。其二，统计决定论把社会历史的每一现象、事件仅仅看作统计意义上的质点，它不计较或者干脆不理睬这些质点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它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决不是统计规律所包容得了的。

对于前一个方面的缺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不能在偶然性面前停止下来，或者跳跃过去<sup>②</sup>。科学一定要在实践提出的难题面前寻求新的答案。现代系统论的诞生，把各种偶然性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不仅堂而皇之地承认了它们的合法地位，而且赋予它们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系统论中，“本质上的偶然性”属于那些几率极小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看作系统微观层次上的涨落。系统运动到某一临界点（分支点）附近时，涨落的实现在系统中具有支配的意义，它对系统形成新的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系统中随机涨落对系统的决定作用，既超出了因果关系的范围，也超出了统计规律的范围，对于这种情形，只能作出系统决定的解释。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缺陷，系统决定论也能予以弥补。系统决定论在更高的层次

① 参阅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9 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0~542 页。

上，把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系统演进和新质产生的基础，既宏观又细微地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反馈调节机制及演化发展过程，科学地显示出客观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如关于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社会运动的合目的性问题，如果用因果观念来解释，那么就只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设想社会是在为一个预设的目的而活动，或者社会出于本性努力实现一幅预定的蓝图。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用统计规律来解释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合目的性，那么又无法区分与社会主体运动过程的关系<sup>①</sup>。根据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社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适应环境并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演化，即朝着更高序列（反熵）更大差异的状态和更高的自组织程度转化，自动地趋向最高水平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社会系统的合目的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还有大量类似的问题，如社会的稳定机制，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继承，社会系统的综合质，社会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等等，都可以由系统决定的理论得到更科学和更深刻的解释。

系统论与决定论的结合，在理论上是有着内在依据的。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现象，即某个变量的行为对平均值发生偏离，使系统离开原来的状态和轨道，然而对于系统来说，涨落正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它使系统不断地打破平衡，从无序走向有序；而系统演化的结果，也总是具有确定性、必然性，这正是决定论的要求。美国系统哲学家 E. 拉兹洛（Ervin Laszlo）在论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系统决定论时，把人的群体和社会整体看作动态系统，认为这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确定的，但所有部件的关联是不确定的。这不是

<sup>①</sup> 参阅拙作：《论社会运动的合目的性》，《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守旧的行为科学家所主张的机械的决定论，而是当代系统生物学家、系统心理学家和系统社会科学家的灵活的、动态的‘宏观决定性’概念<sup>①</sup>。这说明在系统论中，系统规律也是一种决定论的规律，只不过它区别于以往其他形式的决定论规律。

决定论容量的再一次扩大，表明了理论自身对于逻辑性、完善性的要求。历史辩证法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它必然不会以单一的因果观念为满足，相反，它肯定事物联系的多样性，要求更多的认识世界的模式。因此，决定论扩大到包括非因果联系的范畴，是辩证法和人类认识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辩证法从本质上是反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它肯定规律性和必然性，因而它的本性是维护决定论的。历史决定论形式的演进，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深化的结果。人类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一般是从单个事物开始，找出单一的因果关系。从单个事物到历史现象群，人们的视野扩大了，认识更深刻了，有了一个飞跃，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突破了因果决定论的局限而演进到统计决定论。人们的认识继续发展，从历史现象群到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社会发生、发展的规律，这种认识不是片面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既有细节又有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把握细节，这就是历史决定论在当代的第三种表现形式：系统决定论。

这个演进过程，当然不是单向性的。系统事物可以看作是复杂的、高级的个体事物，而个体事物可以看作是低级的系统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系统决定论看作是对因果决定论的高一层次的回复。同时，系统对于群体来说，包括了群体的许

<sup>①</sup> E. 拉兹洛：《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3-104 页。

多重要特征，如偶然性、统计性等，但又不同于群体事物的不相干性、加和性，因而是对群体事物的扬弃。这样，系统决定论既具有因果决定论的特性（当系统对于上一层次的系统而被看作是个体事物的时候），又具有统计决定论的特性（当系统发展是“由它们各部分之间的个人统计性相互关系造成”<sup>①</sup>的时候）。虽然系统决定论具有因果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的特性，但它在本质上又不同于后者，它既不以因果律为基础，也不以统计规律为基础，它是以系统演化规律为基础的高级形式的决定论。理论描述的对象愈复杂，愈能表现理论的深刻性和高层次性。从单个社会历史事件到大量历史事件群，再到整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描述对象的提升也带来了描述方式的提升，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也就成为螺旋式地渐次上升的认识形式。

### 三、历史决定论三种形式的适用场合

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sup>②</sup>，而人们的行动总是具有自觉性的意图、追求某种目的的，因此社会历史现象较之没有任何自觉目的存在的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我们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不是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能机械地运用决定论的各种形式。

一般地说，解释单个的历史事件，因果决定论是一种具有

<sup>①</sup> E. 拉兹洛：《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3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3 页。

说服力的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sup>①</sup>观察社会运动也是如此，人们首先遇到的是单个社会现象的前因后果。这与人们认识过程的基本顺序是相吻合的：从个别到一般。人们从无数个别的历史事件中才得以发现和总结出历史的一般规律。

因果性联系所揭示的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不同的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结果对原因来说具有必然性。试看以下几例：

因为梭伦实行了改革，导致公元前 5~6 世纪雅典城邦奴隶制经济和奴隶制国家迅速发展。

因为秦二世的暴政引起人民不满，导致秦王朝灭亡。

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

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以上均是对单个的历史事件中因果联系的描述。这些联系是客观的而不是杜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决定的关系。

这是社会历史领域中因果决定论的一般运用。这种运用的逻辑推衍，可以得出社会运动的普遍结论。比如，中国古代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原因。正是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了规模、形式、持续时间、后果等各异的农民起义。因果关系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把历次农民起义的情况联系起来考察，就可得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般原因和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50 页。

般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百姓生活涂炭之时，即会爆发农民起义。类似这样的一般结论，还有如商品交换的发展决定了货币的产生，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等等，这些一般性结论都是对大量个别因果关系的抽象而得出的，因而它们本身也可以作为因果决定论适用的场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因果决定论与拉普拉斯的严格决定论是有区别的。后者把自己适用范围规定为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的一切场合，肯定任何情况下精确预言的可能性，排斥偶然性；而前者只适用于有限的场合，它不对任何社会现象作精确预言的承诺，因为它肯定偶然性（包括“本质上的偶然性”）在自身之外的领域中存在。

另外，由于单个历史事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系统，因此能够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其演进过程。这样，对于单个历史事件，除了可通用因果决定论作出说明外，亦可运用系统决定论作出说明。

因果决定论作为一种传统的决定论形式，虽然可以根据事物的自身性质、起始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事物作出必然性的说明，但它的解释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它对事物的涉及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表层的。事物的很多深层联系，是必然的却不一定是因果的。同时，所谓“单个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我们在观念中的事实。客观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是与别的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是“单个的”。“为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